

上海奉贤多元合围推进诉源治理

□ 本报记者 余东明 张海燕

不久前,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创设“奉法客堂”,将法官派驻社区“生活驿站”,定期开展巡回审判、矛盾调解、法治宣传和专题讲座,形成诉源治理的合力,被群众誉为“家门口法院”。

“诉源治理重点在于源头治理,关键在于多方力量的整合与引导,目标在于最大限度将纠纷化解在基层,消弭在萌芽。”奉贤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叶伟为说,“创设‘奉法客堂’,旨在协调各委办局和基层党委政府的力量,使之形成多元合围之势,构建关口前移、源头预防、快速化解的诉源治理新格局,充分体现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相结合的多元治理优势。”

困境倒逼机制创新

立案登记、诉前调解、速裁快审、上诉移转、信访接待……在奉贤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这些连轴转的工作任务令法官们应接不暇。

据了解,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利益结构的深度调整和疫情的持续影响,很多原本积压的矛盾纠纷集中凸现出来。数据显示,2020年、2021年奉贤法院收案量均接近4万件,法官人均结案数近400件,远超上海市各基层法院的平均水平。

“‘案多人少’是基层法院普遍面临的难题,在奉贤地区尤为突出,开展诉源治理就是为了有效缓解案多人少的窘境,同时也通过‘东方智慧’为民众排忧解难,更好地服务于群众。”奉贤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江敏超说。

然而,采取怎样的方式、通过怎样的途径才能实现更加高效的诉源治理能力呢?奉贤法院开展了广泛务

实的调研,从中发现了四方面的问题。

其一是诉源治理绝非法院一家唱独角戏,而许多地方矛盾纠纷治理主体之间协同性不足,“各自为政”“单打独斗”导致联动化解成为一纸空文;其二是长期以来人民群众过度依赖司法救济,对调解等非诉解纷途径认可度不高;其三是调解队伍职业化、专业化水平不高,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一些地方还存在人浮于事的弊端,消减了人民群众对纠纷调解的信任度和公信力;其四是法官平时忙于开庭审案,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不高,更无精力走访群众、巡回办案、指导调解,从而陷入“坐堂收案、闭门办案”的困境之中。

“形势倒逼创新,我们在了解诸多问题后,认为尽管前期开展诉源治理需要花费较多的人力和精力,但从长远看只要推动形成良性循环,就能有效构建全新高效、公平正义的司法生态。为此,我们以‘奉法客堂’为载体,搭建一站式多元解纷平台。”奉贤法院副院长李琴说。

一站受理多元化解

不久前,奉贤区某商户通过网上立案平台,向奉贤法院递交起诉材料,要求某商场减免疫情期间的部分租金。奉贤法院收到案件后,经过评估,认为可启动诉源治理,以一案之力解决所有商户共同难题。

法官依托电子卷宗同步生成系统,将案件推送到多元解纷平台,并同步移送奉贤区司法局智慧调解平台,随后由法官领衔多方力量组成调解小组,依法开展调解。据悉,这起案件自立案到调解成功仅用了3天时间,并促使商场按相同标准给所有商户减免了疫情期间的部分租金。

案件之所以能够如此高效解决,完全得益于奉贤

区人民法院构建的线上线下一体化、区、街(镇)、社区(村居)三级联动的诉源治理新格局。与此同时,奉贤法院在诉调对接过程中,又建立了分类、分层、分级“三分”化解机制。

据介绍,奉贤法院与区妇联、工会、团委、市场监管、消防等职能部门的对接,建立了婚姻家庭、劳动争议、消费争议等领域的诉调对接机制,与奉贤区司法局、律协三方共同建立了律师参与矛盾化解的工作机制,与物调委、交调委、医调委等7家区级专业调解组织形成联动机制,从而构建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非诉调解网络。

与此同时,通过构建三级联动机制,奉贤法院将诉源治理的网络触角深入基层,覆盖全区。在区级层面,奉贤法院诉调对接中心与区司法局非诉中心合署办公,物理空间相邻,数据信息互通;在街镇层面要求各业务庭室与街镇司法所有效衔接;在社区层面要求设立“奉法客堂”,与生活驿站无缝对接。

此外,奉贤法院通过分类、分层、分级的“三分”化解机制,根据案件的简繁、难易程度进行分类处理,适合走诉调对接处理的坚决先走调解程序,不适合调解处理的坚决进入诉讼程序;对进入调解程序的案件进行风险评估,确定维稳风险等级,制定相应调解方案;最后根据管辖层级进行对口分层处理,指定管辖地集中化解。

为了提高工作质效,奉贤法院与区司法局会签了《关于深化探索调解程序前置工作的实施细则》,确立导入调解前置程序的案件类型,分层委派、调解分配、司法确认等内容,涵盖了从立案窗口引导案件进入非诉程序,再从非诉中心退回法院的全流程。

下转第三版



图为藤县太平镇陈垌村村民学习村规民约。

梧州市委政法委供图

□ 本报记者 马艳
□ 本报通讯员 高寒

“学土星、守纪星、奉献星、卫生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金鸡镇同荣村,村民家门口张贴着“摘星”荣誉,村里探索试行“评星制”,对全村村民进行评星定级,激励村民“追星”“摘星”。

为全面深化基层平安创建工作,梧州市深入开展以“六无”(即无黑恶势力、无毒品、无邪教、无刑事治安案件、无群体性事件、无失信被执行人)为主要内容的平安村(社区)建设活动,各地因地制宜,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激发群众自治内生动力,全力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党建引领凝心聚力

在开展创建“六无”平安村(社区)工作中,梧州市坚持以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乡村治理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

藤县同心镇同心社区秉持“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念,积极探索社区治理路径,创新构建“民心党建+”体系,建立“社区、小组、居民”三级网络,将创建“六无”平安社区活动融入平安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基层党建工作中。

通过“民心党建+自治”运行体系,同心社区大力推进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不断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和党员参与决策制度;通过“民心党建+法治”保障体系,结合群众反映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普法活动;“民心党建+德治”体系弘扬清风正气,引导群众破除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习,大力倡导乡风文明新风尚。

苍梧县木双镇万安村与广东省封开县大王口镇长群村、群胜村和都平镇高浪村相邻,为了创建“六无”平安村,万安村积极探索毗邻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构建“党建引领平安、边界联创共治”模式,围绕党建联动、产业发展、文化交流、民生互助、治安联防、矛盾联调、边界共治7个方面展开沟通合作。

藤县太平镇陈垌村积极探索“党建+治理”为主的“党群共建共治联合体”,将党员干部、村民小组长、禁毒社工、乡村建设综合服务中心干部编入网格中,细化微网格,形成“镇-村-网格-微网格-户”一张网,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智慧治理多元共治

梧州市坚持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社会治理理念,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协同作用,最大限度激发自治的内生动力,建立完善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

万秀区角嘴街道潘塘社区是一个集居住、商业、休闲为一体的综合型社区,在社区一站式多元矛盾纠纷调处平台,可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心灵驿站配备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为市民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为了推进“六无”平安社区建设,在梧州市委政法委的指导下,潘塘社区创新探索“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社会治理新模式,实现了中心牵头、网格管理、民生服务、数据分析、远程处置“五位一体”的工作效果。

潘塘社区党委书记李晰介绍,为发挥社会治理基础网格作用,潘塘社区将辖区划分为13个基础网格,设置13个网格党小组,构建“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四级网格治理服务体系,做到“网中有格,格中有户,人在格上,事在格中,格事尽知”,各类事项受理、分流、办结、反馈有效衔接。

如今,潘塘社区全力打造“一个终端采集、一个中心共享、一个平台联动”的智慧化社会治理应用平台,构建起群防群治、多元化解的处置体系,90%以上的事项实现“云端办理”。

蒙山县蒙山镇哪啦村在实践中创造出“党支部+和谐农事协会+综治中心户+平安家庭互助组+星级和谐户”新模式,推出综治(法治、治安、反邪教)中心户,并成立了村级公共安全应急分队。村里设立了“警务观察点”,并将“警务观察点”打造成村屯“老百姓家门口的派出所”,成为百姓生活的“守护神”。

人人参与人人共享

为了让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六无”平安村(社区)创建活动,岑溪市、藤县创新推行文明实践积分卡制度和“评星制”办法,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公共事务,参与到乡村治理的实践中。

岑溪市推行乡村文明实践积分卡制度,把环境卫生、公益志愿服务、助人为乐、获得荣誉奖励、参与乡村振兴等10个事项纳入积分奖励,并成立专门的文明实践积分评比小组,每月组织开展一次评比活动,给予突出者一定的文明积分。目前,岑溪市共有8个镇27个村推行文明实践积分制,极大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

金鸡镇同荣村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基础上,把村民遵纪守法、勤劳致富、环境卫生等作为创建评选基础,精准设置守纪星、卫生星、互助星等12项“星标准”,按照分类定标考评、量化考核、加分减分相结合的原则,对全村村民进行评星定级,村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乡村文明不断焕发新气象。

除此之外,平安梧州建设协调小组协调在全市范围内所有加油站、洗车店、农村信用社等给予实现“六无”村(社区)的网格员、“两委”村干部和村民免费洗车,加油优惠以及降低贷款利率等激励。

“下一步,梧州市将以‘六无’平安村(社区)建设活动为载体,建立完善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强化矛盾纠纷预防和多元化化解机制建设,进一步夯实基层治理基础,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梧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邓旭升说。

梧州多措并举激发农村社平安建设内生动力



年关临近,为保障当地农民工及时领到劳务工资,江西省德兴市公安局会同信访干部,深入辖区民营企业生产现场,了解工资发放情况,并对企业提前提醒,防范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发生。因为民警会同信访干部向农民工发放宣传资料。

本报通讯员 卓忠伟 摄

阎良法官进网格司法服务暖民心

□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 本报通讯员 王芝

“巡回法庭来到我们网格现场开庭审案,既给我们普及了法律知识,也让我们对法院有了进一步了解。”近期,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在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关山街道永丰社区第一网格现场开庭审理。

庭审过程中,原告和被告围绕争议焦点发表了各自意见,审判员析法明理,法庭依法当庭宣判。庭审后,法官就辖区内易发多发的民间借贷、婚姻家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等纠纷以案说法,提出了纠纷的预防和解决

方法,受到群众欢迎。

近年来,阎良法院积极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大格局,着力打造“网格+法院”双向互动工作模式,将司法触角延伸到社会治理“最末梢”。

建强源头解纷阵地

阎良区下辖7个街道,32个社区,73个行政村,共划分172个网格。如何提升网格化管理能力,发挥法院干警的专业优势,为群众提供精准精细化司法服务?经过详细调研和论证,阎良法院通过与区委社会治理办联合,将部分法官(法官助理)以网格员身份编入相应网格,确保每一个网格都有法官(法官助理),让他们深度参与网格治理,积极开展巡回审判、法律咨询、矛盾排查化解等工作。

2022年4月,该院成立了“无讼社区(村)”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后与区委社会治理办联合挂牌成立“网格+法院”无讼社区创建办公室,全面推行法院入驻综治网格中心工作模式。

据了解,自2021年以来,阎良法院先后十余次深入网格组织开展“菜单式”培训,由网格员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法官(法官助理)定期向网格员提供法律知识、传授调解技能、分享调解经验,助推网格员发挥职能作

用,真正把服务群众、矛盾排查化解落实在网格。

破解长期送达难题

“我们网格员与社区居民打交道多,人熟门清,以后法院需要我们配合,打电话就是了……”网格员马永刚热情地对法院工作人员说。

近期,阎良法院民事审判庭受理了一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法院工作人员前往阎良区公园道社区与马永刚取得联系。在介绍完案件情况后,法院工作人员协同马永刚对案件当事人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送达,经过一上午的协作,几十位当事人的材料全部送达完毕,并有部分案件取得初步调解意向。

“‘送达难’越来越成为制约人民法院案件审判和执行效率的‘大问题’,尤其是直接送达工作,面临着人难找,地难寻,受送达人去向不明,同住家属身份难确认等难题。”阎良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王惠惠坦言。

针对这一问题,2021年起,阎良法院在西安市率先启动法院法律文书网格化送达工作,通过为网格员颁发工作聘书,按照“法院干警+网格员”送达模式,让网格员发挥人脉熟络、了解情况的特长,提升了案件的送达效率和送达质量。

下转第三版

“外汇大神”现形记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梅静 周颖

自称只是给朋友帮忙,实则是倒卖外汇。圈内所谓“大神级”人物张某被警方抓获后百般狡辩,最终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低头认罪。近日,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张某犯非法经营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经开庭审理,采纳检察机关指控事实和量刑建议,以非法经营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巨额资金频繁对倒存蹊跷

2022年1月,邗江区检察院接到公安机关商请,对一起倒卖外汇案件提前介入侦查。

“账户巨额交易资金频繁对倒,却声称只是帮朋

友解决外汇需要,没有营利目的,其主观故意如何认定?倒卖数额如何计算?”警方道出了困惑。

202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扬州市中心支行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张某名下的资金账户在短时间内日常频繁,且总额达1亿多元,疑似涉嫌非法跨境转移资金,遂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警方初步审查后认为,张某可能涉嫌非法倒卖外汇,当即立案侦查。2021年12月,长期潜逃在外的张某被抓获归案。在其家中,警方搜查到日元、港币、美元、韩币、泰铢、新加坡币等不同币种,折合人民币7万余元。

面对讯问,张某坚称自己仅仅是为了帮朋友的忙,并没有实施倒买倒卖外汇行为。为此,警方向其所谓的朋友王某了解情况。王某有家人长期在国外,需要大量外汇,但因个人年度兑换外汇额度有限,正着急用的王某颇为焦虑。之后,正是张某帮助其再次兑换到所需数量外汇,并在此后的一年,帮助王某及其家人、朋友兑换外汇500余万元。

下转第三版